資料發掘、女性書寫及文學史重探:論台灣女性日語短詩與主體形構——關於 1930 年代台北第三高等女學校的短歌教育——

報告:豐田周子

翻譯:趙偵宇

【目次】

- 一、前言
- 二、台灣女性書寫與「短歌」
- 三、作為日本女性基本教養的「現代短歌」
- 四、诱禍殖民地教育傳來台灣的短歌
 - 1、台灣對於「現代短歌」的受容
 - 2、第三高等女學校的短歌教育
- 万、結語

一、前言

日本在其所殖民統治、支配的地區當中,為求落實皇民化政策而實行國語教育, 其中,以日文三十一字進行書寫的「短歌」創作受到了重視,這樣的現象,對於當 時台灣少女的自我成長,帶來了一定程度的影響。

本研究的最終目的在於,藉由探討戰後初期台灣女性文藝在台灣文學史上的空白,來為台灣女性的精神活動進行定位¹。現階段則將著眼於台北第三高等女學校(以下簡稱為「三高女」)的短歌教育,以探討日治時期移植到台灣來的「短歌」²及其與台灣女性精神活動之間的關係。筆者將透過此次文獻調查中所得到的成果,思考短歌作為日本傳統文藝形式如何被置入在殖民地的女性教育當中,以及後來如何與台灣女性的自我形成產生連結的問題。

¹ 筆者曾在 2020 台灣文學學會年度學術研討會上發表〈從「少女」到「女性」,以及作為此自我成長之方法的「短歌」——發掘戰後初期台灣女性文藝〉,該題目獲得台灣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主辦之「2023 年度外籍學人來台漢學研究獎助」,在上文的基礎上,筆者加入了此次獎助的研究成果。該研究中心的葉毅均(前漢學研究中心學術交流專門員)給予了筆者許多幫助,在此謹致謝忱。

² 本文所云之「短歌」,所欲指涉的不僅是自平安時代以降以三十一字寫成的「短歌」,而更是明治時期以降,為求自由與個性而脫離定型句式,歷經變革之後的「近代(現代)短歌」。

本文試圖從「短歌」這個面向著手,填補台灣文學史當中對於戰後初期台灣女性文藝的論述空白,並藉此來再度檢視台灣女性的精神活動。在探究「短歌」於近代日本女性教育中所發揮之功能的同時,一併考察此種文藝型式被以何種之目的列入殖民地的女性教育當中,又如何與受過當時高等教育的台灣少女們的自我成長有所關聯,以及如何成為一種表現內在之手段等等問題。

二、台灣女性書寫與「短歌」

出生於戰前的台灣女性作家陳蕙貞(1932~2005),於 13歲時寫成的日文小說《漂浪的小羊》(1946年出版,以下簡稱《漂浪》)當中,描述作為主角的台灣少女以「短歌」或是「俳句」表達其懷念親人的心境。小說當中對於日中傳統文藝的描寫是按照性別、親子來分的:少女藉由上述日語短詩來書寫內在,而主角的父親則是以漢詩來表達憂國之情3。此外,在日治時期的代表作家辜顏碧霞(1914~2000)的私小說《流》(1942年出版)的結尾部分,亦有受過殖民地近代化教育的台灣女性歌詠短歌的橋段。除此之外,我們透過書寫台灣共產黨創立人謝雪紅(1901~70)的《謝雪紅評傳》(1998年出版)一書,亦可看到謝氏平常便有在創作短歌的相關記述4。

如上,倘若我們去觀察 1940 年代台灣女性書寫或是傳記,便會意外地發現她們與「短歌」多有接觸。這件事情指出,台灣女性在其私人空間當中,應該以日本的短詩文藝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創作。然而在現行的台灣文學研究當中,對於日語短詩文藝的討論並沒有取得進展,這或許是因為短歌是一種使用古語的文藝,而短歌資料的缺乏也可能是其中一個因素。

那麼,對於經歷過日本近代教育的台灣女性來說,「短歌」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存在?為了探討這個問題,本文將先從 1930 年代在日本「內地」形成的「女學生文化」開始,討論「短歌」之於受過近代教育之女性之意義。接下來,本人將以三高女為例,探討此種日語短詩文藝的創作文化,如何對於 1930 年代在殖民地統治之下的台灣女性教育造成影響。

 3 梅家玲〈台灣文學史外一章——《漂浪的小羊》」(陳蕙貞《漂浪的小羊》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小、2015)、 $11\sim13$ 頁。

⁴ 陳芳明指出,謝氏在獄中書寫自傳、創作「和歌」等行為,正確切說明了即使是在獄中,她的整體精神活動也從未因此而中斷。(陳芳明著、森幹夫譯《謝雪紅・野の花は枯れず楽土不凋雨夜花》社会評論社、1998、179頁)。)只不過,就筆者管見,在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我的半世紀》(台北市、楊翠華、1997)當中,並沒有與此相關的記載。因此,這部分需要更進一步的求證。

三、作為日本女性基本教養的「現代短歌」

稲垣恭子在考察戰前日本內地的女學校與女學生之間的關係後指出,在女學校開始增設的 1920 至 1930 年代,以少女雜誌為代表據點,並擷取大眾摩登文化養分的「女學生文化」逐漸開花結果。

稲垣指出,我們可以得知,根據 1930 年代後半以小說為中心所作的閱讀調查,各個學級皆有超過八成以上的女學生讀過刊載在雜誌上的小說5;並且,隨著年級愈高,女學生的閱讀傾向便有著漸漸從「少女小說」轉成「通俗小說」的現象6。而根據稲垣所提出的資料,我們同時還可以看到,雖然詩歌或隨筆等文類的人氣不如「小說」一般,然而在一、二年級(十二、十三歲)的階段基本上無人閱讀的詩歌或隨筆,到了五年級(十六歲)的階段,相關的閱讀經驗便增加了約莫一成左右。據此可以得知,女學生精神年齡的成長,導致了她們在讀書傾向上的變化。

1920年代以降,積極引進文學的「女學生文化」,便以名為培育「教育素養」 之旨而擴建的高等女學校的學生為中心,向外擴展至全國性的規模。另一方面,此 類教育素養的培育並非只限於學校,在一般家庭當中亦有類似的「學習項目」,用 以補充學校教育當中的不足。

與前述的陳蕙貞同一世代的馬場あき子(1928~),是日本的女性歌人代表, 她於 1940 年進入東京中野區的昭和高等女學校(現今為「昭和女子大付属昭和中 学校・高校」)就讀。她曾經回顧被當時的日本女性視為教育素養而喜愛的「現代 短歌」,並敘述如下(底線由筆者所加,以下皆同):

山櫻花落,枝頭上,或有露水訊息〔譯註:原文為短歌,山ざくら花散り果てし木の幹を静かに露の伝ひ居るかも〕/<u>我是在進入女學校就讀之前,便受到有在創作短歌的伯母影響,而開始詠歌。</u>這首便是我年幼時與喜好釣魚的父親一同外出時所作的短歌。那個年代的昭和高女,是一間時常讓學生體驗文化活動,如電影、展覽、博物館、表演舞台等等的學校。<u>過去我對日本的古代禮制充滿興趣</u>,故二年級的時候,便以此為方向寫作了一首「女官服飾」,而拿到了「優秀」的獎賞。而那時我寫的暑假作業是閱讀島木赤彦歌

⁵ 此處指的是於 1935 年針對東京市內的高等女學校所作的學生閱讀調查。總調查對象約有 1300 名學生。稲垣恭子《女学校と女学生》(中公新書、2007 年)、57 頁。

⁶ 此處參考的是稲垣根據松本金壽・安積すみ江〈女学校生徒に於ける課外読物の一調査〉(《教育》第4卷4號、1936年)一文所作的「表1-5 女学生が読む現代文学の内容分類(表1-5 女學生所閱讀之現代文學的內容分類)」。該份調查是於1936年,針對東京、三重、愛知的高等女學生與實科高等女學生所進行的閱讀調查,調查對象總計1616名(參照上引稲垣著作,66頁)。而在1937年針對「東京、地方〔譯註:指東京以外的日本其他地方〕」的文學閱讀經驗所作的調查當中,小說或是戲曲的比例,在各個學年當中亦佔了七成以上(參照上引稲垣著作,58頁的「下表」)。

集的心得,雖然我寫說「很無趣」,但老師稱讚了我那篇心得。此即我與現代短歌結緣的第一步。⁷

據此我們可以看到,在戰前的日本,尤其是在當時具有一定文化水準的日本家庭當中,日本女性對於短歌的愛好,乃被視作為一種「教育素養」。若從馬場的這段敘述來看的話,到了1940年代以後,在日本中上流階級的家庭當中,有這類少女們在進到女學校就讀以前,其身邊即有能夠創作「短歌」的女性前輩來為她們的教育素養打好基礎的案例,應是不足為奇的8。日本的少女們便像這樣,無論是在公領域或私領域,皆能獲得接觸「現代短歌」的機會。

有了上述的討論之後,現在我們來看看陳蕙貞的日語小說《漂浪》中所出現的,台灣少女歌詠短歌的場景吧。

比方說,在一場她離家後來到新潟參加的賞月宴會的場景中,有著這樣的描寫:「最近,慧真(案:故事主角)開始以俳句或是和歌來表達自己的思家之情。在由她自己所編排的歌集當中已經收錄了不少作品。她隨口一哼便是,身在遙遠的雪國,心卻已飄飛到我那在東京的家之類的句子。」9此外,主角還被徵召到山上搬運柴薪,而在嚴酷的體力勞動之餘,依舊歌詠短歌:「慧真從口袋中拿出筆記本與鉛筆,在筆記本上寫下了腦海裡浮現的和歌。而她總是在回到宿舍後,再將和歌抄在歌集當中。過去她住在東京的家時並不常詠歌,但彷彿一換了環境就換了習慣似的,現在當慧真一遇到什麼事,腦海裡就會浮現出俳句或是和歌。」10

從這樣的描寫當中,我們首先可以看到,短歌成為了在日本生活的台灣少女用來表現其內在的手段,主角愈是習慣創作短歌的方法,我們就愈能從中看到少女內在的成長與短歌創作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

四、透過殖民地教育傳來台灣的短歌

1、台灣對於「現代短歌」的受容

那麼當時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短歌的受榮情況是如何呢?

磯田一雄針對戰後台灣的短歌、俳句所作的相關研究,已累積了相當的成果。 根據磯田的研究,在台灣,由台灣人所進行的短歌或是俳句的創作,自 1920 年代

⁷ 参照馬場あき子〈語る一人生の贈りもの(5)〉(《朝日新聞》2018.10.15、10 版)) 下文引用的底線為筆者所加。

⁸ 作者陳蕙貞本人也說她從日本人養母,以及該家族的其他女性成員那邊受到了日本文學以及「和歌」的薫陶。她身邊有著身具短歌、俳句素養的女性存在,此「教育素養」對她的影響程度也應當會較之他人強烈。在《漂浪》當中,即有作為主角的少女在小學六年級時便歌詠和歌、俳句的情節出現。

^{9 《}漂浪》,139頁。

^{10 《}漂浪》,152頁。

起已可得見,但要等到 1931 年的滿州事變過後,才開始蓬勃發展。台灣人之所以「接受」日文的短歌或是俳句,其中一個原因是,這個時期的台灣人對於日文短詩文藝的文學形式以及存在於其背後的日本文化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與熟悉。誠如吳建堂(筆名:孤蓬万里、1926~98)、吳濁流(1900~76),或是郭水潭(1908~95)之所云,對於難以熟習漢詩平仄、押韻的年輕一輩來說,短歌或是俳句的形式反倒是「較為容易親近」的存在,因此被當作是能用表現日常生活種種的一種工具而被接受11。

又誠如龍瑛宗($1911\sim1999$)所言,應亦有不少人是受到學校老師的引領, 而維到了短歌的世界 12 。

倘若再將「描寫對象」列入考量的話,那麼筆者認為,相較於偏好表現敘事性、政治性,並具備在公領域進行發表之性格的漢詩,短歌或者俳句,則更具有能夠寫實地表現出日常的瑣碎事物或是人的內在層面之優點。殖民地台灣的強勢語言乃是日文,那麼我們或許可以這麼說:現代短歌的接受情形之所以在當時發生,並不是因為人們強烈意識到「殖民地」這個框架,而是因為現代短歌乃正好符合「近代」,這個以表現「個人」內在層面為要求的時代之故。

此外,針對有關日文短詩文藝的學習與出身階級、文化、教育之間的關聯性, 磯田在基於派翠西亞·鶴見(E. Patricia Tsurumi)、植野弘子的考察後指出,「在殖民地台灣的台灣人社會階層當中,可以看到上流階級具有積極接受『日本化』(近代化)的傾向,而進入高等女學校就讀的那些女性,也比其他階層的男性受到了更多的『日本化』教育¹³」。

據上,對於受過當時台灣高等教育的少女們而言,所謂的「日本化」,或許可以說便是習得日本「內地」的中上流階層的文化,亦即是被視為「教育素養」的「短歌」或是俳句等等傳統的短詩文藝。

短歌是日本的正統文藝,但同時又是一種具備「才藝/教育素養」性質的小道;或許正因此,短歌方能在皇民化政策或是戰時體制等政治性格濃厚的時期,成為少女們記錄日常心緒的一種表現媒介。

從「閱讀」到「書寫」,從「學習」到「創作」;將自己的思緒凝縮在三十一字的日文語言當中來進行表現,少女們藉由反覆進行這種主體性的創作行為,一步步深化自己的內在而走向成熟,在這樣的過程中,短歌逐漸成為了一種能夠證明自身存在的必要手段。接下來將以三高女為例,初步探討這當中的具體狀況。

5

¹¹ 磯田一雄〈戦後台湾俳句小史(一) 戦前期台湾の国語教育と俳句・短歌 —生活表現の「日本化」・「近代化」—〉(《成城文藝》239、成城大学文芸学部、2017)、8 頁。

 $^{^{12}}$ 〈萬葉集の思ひ出〉《龍瑛宗全集》(五)「詩・劇本・随筆集」國立台灣文學館、2008 年、160 頁。

¹³ 見上引磯田論文(2017),9頁。

2、第三高等女學校的短歌教育

三高女乃是台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的前身,眾所周知,這間明星學校培養出了陳進(1907~98、台灣第一位女畫家)、李緞(1909~95、政治家)、謝娥(1918~95、台灣第一位女外科醫生)等名人。

這所學校先是於日治期間的 1897 年,作為「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女子分教場」而在士林設立。之後,歷經了「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1898)、「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附屬女學校」(1910)等階段,後成為「台灣公立女子高等普通學校」(1919),而在 1922 年升格為高等女學校,校名改為「台北州立台北第三高等女學校」,並因「日台共學」,而開放讓日本人進入這裡就讀¹⁴。之後,搬移到新的校舍(1937),戰後改名為「台灣省立台北第二女子中學校」¹⁵。

筆者將根據下列五種資料對三高女學生的短歌進行探討,不過資料⑤由於保存不全,現階段將只針對能判讀的部分來討論。

- ①:《台北第三高等女學校創立滿三十年記念誌(下)》(1933)
- ②:《台北第三高等女學校創立三十五周年記念誌》(1933)
- ③:《台北第三高等女學校新築移轉記念錄》(1938)
- ④:《明治神宮獻詠歌集》(1932~42)
- ⑤:《扶桑(三高女同窗會誌)》(1939~1941)

當中值得關注的是該校於 1930 年代的短歌教育。我們可以透過新井淑子針對曾任 三高女教師的日本人女性所做的訪談,而一窺台北第三高女的短歌教育情形。根據 新井的研究,台北第三高女的「國語」科時數較之其他女學校為多,為了讓台灣人 學生能夠在就學期間便習得「高檔的日文」,故將必須得嚴選用字的短歌列為必修 科目。在學或者畢業生所創作的短歌,在上述的①、②、③等跟校史有關的記念冊 當中亦有刊載。

對於這些作品,評語寫道:重視短歌的傳統形式,但並未失去創作者的個性,可見其苦心。並以書寫對於短歌教師的回憶之學生創作為例,指出她們歌詠出個人的真實情感,「歌心」甚至能與《記紀·萬葉》相通¹⁶。根據這些文字,我們可以推測三高女的短歌指導,十分重視日本傳統藝能當中的求道精神。

¹⁴ 此外,亦有可見疑為台灣原住民族的學生姓名。

¹⁵ 黄彬彬〈台北第三高等女学校物語〉(中京大学先端共同研究機構社会科学研究所編・線上史料《記憶のアーカイブ》、2022)、13 頁。

¹⁶ 向山斧太郎〈被講会の壮士と和歌添削の苦心〉,《台北第三高等女学校創立三十五周年記念誌》、88 頁。

表 1:「校史中所刊載之三高女學生的短歌」(筆者製表)

1933年	『台北第三高等女学校創立満三十年記念誌(下)	J				
	御題「河水淸」披講歌 生徒の部					
	淡水の皮の水底すみにけり榮ゆく御代の影をうつして	卒業生	王劉氏本子			
	初日かげうらゝにさして門川の瀨々の小魚も數よまれつゝ	補習科?	陳氏汝			
	神代より流れ絶えせぬ五十鈴河萬代かけて澄み渡るらん	四年生	余氏良玉			
	春かすみ匂ふ吉野の川水は雪げながらに澄みわたるなり	四年生	范氏湘妹			
	初日影照りそふ島の溪川に昔ながらの淸水ながるゝ	四年生	杜氏輕煙			
	水底にみどりの草のかげ見えて流るゝ水のいと清きかな	四年生	李氏玉			
	年立ちし水のながれを眺むれば底の眞砂もかぞへつくさる	四年生	立野靜子			
	底までもさやかに見ゆる宮のへの川の流の水上遠し	四年生	陳氏春			
	初日の出輝く水の面淸く四方の山邉を映してぞすむ	二年生	陳氏阿景			
	初日の出清き流れに照り栄えて水の面の美しきかな	二年生	三橋三代			
	のどやかに初日の光照る川に魚の泳ぎも見えて嬉しき	二年生	林氏秀琴			
1933年	『台北第三高等女学校創立満三十五周年記念誌』					
	湖口ぞよ気を許すなと告げ給うみこえにいつか涙ながるる	?	?			
	足なみを揃えて帰るつはものをむかへて照らす月のさやけさ	四年生	林氏珮貞			
	鮮やかに床に残れる宮様のお靴の跡もなつかしきかな	二年生	荘氏素娥			
	一心に唯一心に針ぬけどふるえる手にはぬく力なき	四年生	王氏月容			
	台覧の誉を得たるこの衣いやひさしくも保たまほしき	四年生	林氏淑子			
	青ければわれこゝにあり葡萄の実紫せん日家にかへらん	?	汪劉氏本子			
	いねられぬ奈良の宿りの夜は更けてしかの音きけばふるさとこひし	?	蔡氏素女			
	思ひ出となれるはかなし高砂のいそべの賎にたまふ御歌の	?	蔡氏素女			
	七とせのめぐみの露におひ立ちし小草も唄ふけさの秋風	?	蔡氏素女			
	今はとて岸をはなるゝくろ船の行方しのびてぬらす袖かな	?	連氏煮治			
	いやさかの学び園に生ひ立ちて値ひしほまれぞ永久にわすれじ	補習科	楊氏慧珠			
1938年	『台北第三高等女学校新築移転記念録』					
	あたらしきこの学び舎に移り来て喜びに満つこの頃の我	補習科	蔡氏阿養			
	学び舎の窓辺に寄れば白さぎのいとかろやかに田の面をとぶ	四年生	王氏金梅			
	美しくそゝり立ちたる学び舎に学びを受くることの嬉しさ	四年生	陳氏勤			
	新しき学びの家に移れりと乙女の顔は喜びに満つ	三年生	江氏朝琴			
	七夕のよき日に移る学び舎の幸祈りつゝ祝ふ今日かな	三年生	蔡氏美徳			
	ま心をこめて祈りぬ学び舎のとはの栄とつきぬさきはひ	三年生	文氏芳美			
	新しき我が学び舎を眺めつゝとはの栄を祈る今日かな	三年生	楊氏碧霞			
	まなびやに幸多かれと我が祈る佳き日に空も晴れ渡るなり	二年生	蘇氏秀			
	ひるがへる旗の下にまなびやの行末長き幸祈るかな	二年生	游氏満			
	美しき学びや仰ぐ乙女等の面に漲ぎる希望の色よ	二年生	施氏素筠			
	みはるかす田の面をわたる涼風の学びの窓にそよぐ涼しさ	二年生	王氏素琴			
	新しき学びの窓もうれしけれふるき学びの園もなつかし	二年生	黄氏碧花			
	新しき校舎の上に乙女等は空のつはもの見送りにけり	四年生	張氏嫩			
	黄金なす田中に浮かぶ学び舎の雄々しき姿みるぞ嬉しき	四年生	葉氏秀鸞			

該校的短歌教育之興盛,很大一部分要歸功於三高女的第二代校長小野正雄(在職期間:1925~41)。小野帶頭獎勵短歌創作,將作品展演帶進教學現場,例如他會一年一度地將學生聚集在講堂,舉辦短歌或談話的聚會。並且,相關活動並不僅侷限於校園,他甚至鼓勵學生參加獻給明治天皇和昭憲皇太后神靈的獻詠會。如下表 2,於 1932 年舉行的④「明治神宮獻詠會」,以「兵營月」為題,共徵

得七千數百首短歌,這當中,就有四年級學生林氏珮貞的作品。此外,在下一年,也就是 1933 年,三高女一共投稿了五百一十九首作品,二年級學生陳氏美女的短歌通過了「神前披講歌」的初選,鼓舞了該校師生¹⁷。從下表 2 也可以看出,1940年以降,獻歌的活動亦仍持續,每年都有五百首左右的作品投稿,在參加該活動的各校中,三高女的投稿數量與頻率都名列前茅¹⁸。

表 2:「三高女學生投稿明治神宮獻詠會的短歌」(筆者製表)

西暦	輯	お題)「学校献詠選歌」における三高女生の入選歌	学年	作者	三高女生献詠歌数
1932	7	兵営月)ものゝふの屯しつかに夜はふけてつきはものみの絵にかゝれり	四年生	林氏珮貞	515
1933	8	秋田)高砂の島にも秋はおとずれて小田にこがねの波寄するかな	二年生	陳氏美女	511
1934	9	海上月)わたつみの波のうねりを一つひとつくまなく照らす月の影かな	?	徐氏柳	579
1935	10	読書)文よみて涙なかしぬ文字しらぬはゝのさひしさふかくおもひて	?	王氏櫻	531
1936	11	山紅葉)故郷の山のもみちそそのはるゝおしはおくれるとものたよりに	?	渡邊美津	542
1937	12	朝霧)霧ふかく甍のうへにたちこめてまたさめやらぬあかつきのまち	?	周氏招治	416
1938	13	軍馬)欠			欠
1939	14	軍艦)欠			486
1940	15	社頭祈世)欠落			639
1941	16	農家)無			336
1942	17	国旗)無			518
		※「欠」は資料の欠落を、「無」は入選歌なしを表す。			

此外,1937年的「靖國神社獻詠祭」,則以「海上霞」為題;日本各地約莫一千首的獻詠歌當中,三高女被選中的師生作品就有一百二十首,其中,共有四名學生(第13屆到第17屆)的作品被選中,供奉在神前¹⁹。

上述事蹟,也可以在當時發行的三高女同窗會誌《扶桑》中得到證實。在該誌的「詞藻」、「歌壇」欄當中,可見許多從一年級到四年級生,以及補習生、畢業生,甚至是教師所創作的短歌。就以筆者目前所見的,自 1939 年到 1943 年第 12 號的卷號當中,便有九百首左右的作品²⁰。

至於學生們所創作的短歌有什麼特色呢?主要是以下列所舉為題材:「考上三高女的喜悅」、「畢業、與友朋告別」、「奈良樫原神宮、吉野、太魯閣峽谷、阿里山

 $^{^{17}}$ 王陳美女(本科第 13 屆學生・補習科第 9 屆學生)〈回憶〉(台北第三高等女学校創校百年紀年誌《光輝百年》、三高女校友聯誼会「光輝百年」紀念編集委員会、 1997 年)、 157 百。

¹⁸ 明治神宮社務所編《明治神宮献詠集》、明治神宮社務所、1932 年~1942 年、国立国会 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2023 年 12 月 31 日閲覧)。三高女之外,亦有下列台灣高等 女學校参加該獻詠會:台北第二高等學校、新竹高等女學校、基隆高等女學校、新竹高等女 學校、台南第二高等女學校、高雄高等女學校、屏東高等女學校。

¹⁹ 黄彬彬〈台北第三高等女学校物語〉(中京大学先端共同研究機構社会科学研究所編・線上史料《記憶のアーカイブ》、2022)、18 頁。

 $^{^{20}}$ 台北第三高等女学校同窓会編。筆者所閱覽的是,1939 年~1943 年之間刊行的第 53~57 號、第 59~61 號、第 63~66 號,共 12 號。(國立台灣圖書館・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jpli2014-pd-ccl_524_2205_6055)。

等畢業旅行景點」、「重陽節」、「攀登新高山、大崙山」、「長途遠足」等學校活動;「胡弓」、「水牛」、「泰雅族」等對學生而言的台灣日常風物;以「宮中歌會始」之「御前披講」作為目標而詠的「勅題詠進歌」,或是反映時勢的「從軍護士、恩師的出征」、「站在產業戰線上守護軍後的女性」、「獻給護國神社的英靈」、「負傷士兵的慰問」等等。

如上,我們可以明確地指出,三高女以短歌作為其修養教育的軸心,並在以 1930 年代來到其全盛期²¹。此外,三高女的短歌創作並不僅限於在學學生,我們 從戰後發行的同窗會誌上也可以看到許多短歌投稿。本文一開始提到的,日治時期 為數稀少的台灣女性作家辜顏碧霞也是三高女出身的,據此,我們可以說該校的短 歌教育亦影響了學生在畢業以後的人生。

三高女的女子教育雖然嚴格,但指導十分細心,透過師生共同參與的教育方針, 使得該校的師生羈絆比起其他女學校還更能長久維持²²。在三高女的教育現場當中, 有著不能以「殖民地教育」來描述的人際關係,在這樣的教育經驗中所習得的短歌, 成為了他們證明自身存在的一種方法²³。

五、結語

1990年代,日本的主流報紙《朝日新聞》中有著大岡信主導的專欄「折々の歌」、台灣人寫的短歌,由於被刊載到了這個專欄當中而獲得了很大的迴響,之後,歌人孤蓬万里(吳建堂)陸續編了《台湾万葉集》、《台湾万葉集(続編)》²⁴而在日本出版。

²¹ 在日治時期台灣中等教育當中,將短歌或是俳句視為「教養」而習得的世代是,1930 年 左右出生,以 42 年為界入學的世代。自 1943 年起,由於處在終戰之前的戰爭體制下,中等 學校的學生都被動員,是以很難在就學時期受到正式的教育。(見上引磯田論文)

²² 筆者針對三高女第 26 屆的學生們(1946 年 4 月入學)進行了訪問。(訪問日:2023 年 9 月 20 日、台北中山北路)

²³ 我們可以從同窗會誌的文章中看到學生對於該校教育的複雜想法。「(前略) 我深刻感到教育是一種可怕的東西。因為三高女的教育,我被洗腦之後從軍。在戰場上看到了被征服的民族之悲哀。「*見せしめに窓に吊られし中国人の死体がゆらぐ終戦記念日」(案:此處為短歌,意思是:終戰日,被用來殺雞儆猴的中國人屍體,吊在窗戶上搖晃著)中日戰爭的本質很明顯的是日本侵略,然而到現在還有不承認這件事的日本人。說是對台灣人一視同仁,但看看三高女的窄門就能知道那不是真的。我在大陸的時候常保冷靜,故不曾沾染過共產主義。人生起起伏伏,我雖然已過七十了,但三高女讓我學到了許多知識,也讓我擁有了許多青春的回憶。我以畢業於這所學校為榮,在這所學校學到的短歌素養,至今仍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樂趣。(原文為日文)」(里洋子〔洪鴛鴦・第18期生〕〈回憶〉,台北第三高等女学校創校百年紀年誌《光輝百年》、三高女校友聯誼会「光輝百年」紀念編集委員会、1997年、197頁)。

²⁴ 《台湾万葉集》(集英社、1995)、《台湾万葉集(続編)》(集英社、1995)

在這兩本書當中所見之台灣女性歌人,皆出生於 1900 至 1930 年之間²⁵。並且,大多數都有在三高女²⁶等校的求學經驗,求學經驗,又或者因為父母的關係而生於東京等「內地」並度過童年。

整體而言,她們所創作的短歌大抵皆有平易近人、口語化、以人物為中心的動作性描寫等特徵。年過六十的她們使用日常語言,描繪照顧父母、與父母或丈夫的離別、婆媳關係、對子孫的慈愛等悲喜,充滿著深意,彷彿累經年輪的樹木。

詩人大岡信(1931~2017)在《台湾万葉集》的序中有著如下言論:

整體而言,台灣短歌有著充分享受短歌形式的創作樂趣,亦有機智、諧謔,以及諷刺的意味。而那諷刺大多都是自嘲,因而從中可以感受到一種健康的平衡感,以及不停以客觀角度觀照自我人生的強壯心靈。對於人生,能夠保有從容,甚至有些時候相當開朗,彷彿已到達一種頓悟人生的境界.....與生俱來的諧謔、辛辣的觀點,這即是台灣短歌當中極其普遍可見的特質,反過來說,這樣的特質便是日本短歌所極其缺乏的。27

日治時期,日語教育作為殖民政策的一環,奪走了當地人原本的語言。據此類推, 三高女的和歌教育也是日本將異民族之少女形塑成「大和撫子」之手段,故我們並 不能忘卻此一歷史事實。然而,在此前提之下,大岡的文字正提供我們去思索一件 事,就是台灣短歌脫離了起源於「內地」,基於大和文字而成的傳統文藝,而獲得 了屬於台灣女性用來表現自我的獨特定位。

本文是筆者根據本次文獻訪查時所發現的大量三高女學生之短歌而整理成的階段性報告,之後將繼續研究,探索這批作品的全貌。

^{25 《}台湾万葉集》與《続編》當中,有具體寫出其生平經歷的台灣女性共有四十九人。年紀最長的人出生於 1906 年,最小的人則是生於 1930 年。整體而言,較引人注目的是出生於富貴之家並有過「內地」留學經驗的人。當中,重要的作家則可以舉出陳秀喜(1921~91)為例。

²⁶ 孤蓬万里的母親吳潘秋女士也是三高女的第二屆畢業生。(〈女権先駆〉、台北第三高等女学校創校百年紀年誌《光輝百年》、三高女校友聯誼会「光輝百年」紀念編集委員会、1997年、87頁)。

^{27 《}台湾万葉集》大岡信序、5~6頁。

〔附記〕

在此由衷感謝台灣大學接受筆者為訪問學人,並感謝該校文學院台灣文學研究所黃美娥教授提點,最後感謝幫忙介紹三高女畢業生給筆者的中央研究院台灣 史研究所詹素娟教授。

此外,亦要對黃彬彬老師以及三高女的畢業生們表達誠懇的謝意,儘管筆者臨時提出要求,他們仍樂意接受筆者的訪問。

本文乃是「日本学術振興会科学研究費助成事業・基盤研究(C)21K00334「東アジア女性による日本語詩歌創作とその主体性に関する研究――台湾と朝鮮を中心に」之研究計畫的成果之一。

【参考文獻】(文中未提及者)

- ·曽文亮訪問/吳美慧·李思儀·林志晟記錄《百年回眸:台北第三高女校友口述訪問紀錄》(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2023)
- •〈第一回勅題歌披講会〉(1926年1月16日)(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典藏網)